

“苏易简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状元,也是宋初四川的第一个状元。《宋史》记载:苏易简,字太简,梓州铜山人。古铜山县在今天四川省中江县广福镇及其周边地区。但近年来,绵阳市游仙区的盐泉镇、三台县柳池镇纷纷建起了苏易简纪念馆,称他们是真正的状元故里。江油市九岭镇也在苏溪村建起了民间状元小庙。因此,关于苏易简是哪里人,目前存在“铜山说”“盐泉说”“三台说”和“江油说”。相比而言,“三台说”和“江油说”根据较弱,“盐泉说”因《永乐大典》有记载,有一些依据。中江在喧嚣中却显得较为沉默,难道《宋史》写错了?事实并非如此。



位于中江县广福镇的状元桥。肖开丰 梁潼/摄

宋初状元苏易简故里之争

□黄礼登

壹

“盐泉说”难以自圆其说

“盐泉说”的主要观点有:苏易简的曾祖父苏振因任职铜山,根据古代地方官回避制,他不得在原籍任职,因此他不太可能是铜山籍;乾隆年间绵州知州屠用谦写的《苏中令易简传》声称曾任中江县令的王一正明确说了中江境内没有苏氏遗迹,是《宋史》搞错了苏易简的籍贯;苏易简是寄应铜山从而在梓州参加乡试。但“盐泉说”并不能成立。

首先,唐末仕人入蜀后在任职地入籍并不鲜见,因此回避之说并不总是适用。其次,据中江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钟力生确认,中江在清朝并没有王一正这么一个县令,因此“盐泉说”论据有误。清康熙年间编修《中江县志》的有一个当教谕的王一贞,但他不是县令。王一贞写过一首《游铜山访苏门三君子祠址》的诗,不可能认为中江没有苏氏遗迹。

最后,苏易简不是寄应铜山参加乡试。宋朝时确有寄应现象,但原因在于原籍的发解名额太少,考生纷纷到名额多的京城开封等地参加考试。盐泉所在的绵州和铜山所在的梓州名额差不多,苏易简如果是盐泉人,没有理由费劲跑到梓州来考试,更何况朝廷还颁布有严惩寄应的规定。近年有学者研究发现,宋初因对官吏需求量大,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无定额发解,因此苏易简完全没有必要去寄应。

贰

欧阳修都不知道《父祖家传》

“盐泉说”还提出苏易简的孙子苏舜钦写的《父祖家传》记载了苏氏定居盐泉的事情,并进一步认为苏易简出生在盐泉。《苏舜钦集》的编辑人是欧阳修,但是他竟然没有看到过《父祖家传》。《父祖家传》里面确实写到苏舜钦的高祖苏寓“至左绵,尤喜其地物爽润,遂葬亲青溪,占数盐泉居焉”。这应该是“盐泉说”的来源。但是这么重要的一篇文章,却没有收录在《苏舜钦集》中。当代苏舜钦研究专家傅平壤、胡问涛也只是把这篇文稿放在其编辑的《苏舜钦集编年校注》的附录里而非正文里,理由就是这篇传记属于“疑似之作”。

《父祖家传》里面提到苏易简时只是称其为“中令”,而苏舜钦写的《先公墓志铭》里面却提到了苏易简“太师尚书令”的头衔,可见《传》写于《志》前。但是《先公墓志铭》既然都被欧阳修汇编,遗漏写在前面的《父祖家传》就说不过去。

《先公墓志铭》应该写于苏着去世的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而《父祖家传》里写到了苏舜钦被任命为湖州长史,这已经是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的事了,因此文稿中关于苏舜钦的内容



中江县广福镇玉江畔的苏公笔。肖开丰 梁潼/摄

不可能是苏舜钦本人写的。虽然很多人打圆场说这是苏泌代替他父亲写的,但这种代笔行为让《父祖家传》的整体可信性大打折扣。

更何况《父祖家传》内容本身有不少不合情理之处,比如里面记载苏寓把父亲苏振的遗骨从铜山带到成都放着而不下葬,直到他到剑州做了一圈官然后又辞官“遍游名山”之后,才在绵州“葬亲青溪”。在他决定定居盐泉时,他的整个宗族都还在铜山,怎么可能同意他把苏振遗骨带出去折腾这么一大圈呢?另外,在郭威建立后周之初,《父祖家传》就借苏寓的口说出了“蜀历将谢,必归火运主”这句话,这是十分可疑的。“火运”是宋朝的德运,后周的德运属木。苏寓说这句话时,后周国势正盛,离宋朝建立还早,但苏寓跳过“木运主”说后蜀将直接归“火运主”,相当于已经认定后蜀与后周必将灭亡并且后蜀绝不会亡于后周。《父祖家传》充满这种神话般的叙事,难怪权威专家会怀疑其真实性。

叁

“铜山说”在宋朝就得到公认

历史上关于苏易简是梓州铜山人的记载不仅数量多,而且更加权威,离苏易简的时代更近。最早的是北宋时曾巩所著的《隆平集》,其中清楚地记载,“苏易简,字太简,梓州人”。曾巩是

苏易简的孙子苏舜钦的同时代人,他的老师欧阳修和苏舜钦是密友,所以曾巩对苏舜钦的家族是熟悉的。《隆平集》是后来元初编修《宋史》的素材资料。此外,苏舜钦弟弟苏舜宾的孙子苏之才的墓志铭上明确写着“太师讳易简,妙龄以梓潼进士魁天下”。这里的“梓潼”就是宋时的梓潼郡,它是梓州在唐时和宋初的别称。可见,苏氏家族明确表达自己是梓州而非绵州的。南宋韩元吉为另一个苏氏家族的苏师德所写的墓志铭开篇就说:“苏姓在本朝凡三望族。其系出梓州者,则太简举进士为天下第一。”可见,苏易简是梓州铜山人在两宋是得到公认的。

现存的两宋严肃文献中并无苏易简是绵州盐泉人的记载。南宋时期的《东都事略》《事类备要》《翰苑新书集》《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明确记录苏易简为“梓州铜山人”。另有《名臣碑传琬琰集》《古今纪要》《宋宰辅编年录》等记录苏易简为梓州人。

明确提到苏易简是绵州盐泉人的文献少之又少,在《永乐大典》和明朝杨慎编修的《全蜀艺文志》中可以看到苏易简是盐泉人的说法。但杨慎在其所撰《词品》一书中,却又明确称苏易简是“梓州人”。到了清朝,尽管雍正年间的《四川通志》记载苏易简是中江人,但乾隆年间的绵州知州屠用谦却依据《永乐大典》认为苏易简应当是出生在绵州盐泉,并将他的观点写进清乾隆《直隶绵州志》。有意思的是,没过多久,新的绵州知州文桢在修清同治《直隶绵州志》时就不同意屠用谦的观点,他在“人物志”中对苏易简写的是:“梓州铜山籍,绵之盐泉人。”此外,他还在“选举志”中将苏舜钦记载为:“入籍郾县。”后者是完全错误的,但这同时说明了绵州志的编修者对“盐泉说”底气不足。

肆

铜山父老修苏公笔纪念苏易简

《永乐大典》说在盐泉发现了“祖司马墓碑”,上面刻有苏寓“上世宦于蜀,乐左绵山水奇秀,挈宗族居焉”的文字,“盐泉说”以此证明苏易简家在盐泉。这块墓碑不见实物,仅见于这份记载,内容的真实性较为可疑。此外,《永乐大典》说这是“中令之父侍郎协所作祖司马墓碑”,也就是说这块碑是苏协为父亲苏寓所立的。可是,儿子给父亲立碑,怎么可能称之为“祖”呢?即便认定葬在盐泉第一代为该地苏氏始祖,那也应当以苏振为“祖”而轮不到苏寓称“祖”。

无独有偶,中江在明朝时也发现了一块石碑。明朝陕西布政司左参议王惟贤在《铜山乡贤祠记》中记载,他在铜山挖出一块宋代的石碑,是南宋宁宗时铜山县令王忠厚所刻,上面有“欲买此

地,绘先达如苏易简诸大老为四贤堂”等字迹。可见,宋朝时铜山一直把苏易简视为当地人。王惟贤感叹:“苏门徙汴之后,故乡声踪斩然。”他认为苏易简一家是直接由铜山迁往开封的,和盐泉没有关系。

《铜山乡贤祠记》还记载,王惟贤在铜山发现了一根宋时“进士题名柱”,上面刻着苏门三世的名字;明朝时在铜山还能看见宋朝时所立的“宋参军赵鼎吉修尉墓碑”,上面刻有“苏易简,国初进士第一,蜀斯文发祥权舆之地”;铜山直到南宋都还有苏易简家族的直系子孙苏伯起在这里生活。

“三台说”的文献依据基本上与“盐泉说”类似。“江油说”的文献依据是清《彰明志略》,其中记载:“宋苏文宪公易简,世居邑之清溪,碑碣故址明代尚存。”而《彰明志略》的依据又是明嘉靖进士金泉所写《李太白祠堂记》中的观点。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苏(颀)太平兴国易简状元之先,世居县之清溪,今碑碣故址在焉,是先生之生在彰明无疑也。”金泉是在写苏颀夸奖少年李白时加了这么一句对苏氏的解释,以至于彰明县令陈谋不得不为此写了一段评语,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在其他书中看到过苏易简一家世代生活在彰明的记载,既然金泉言之凿凿,那应该不会有假。总体来看,“江油说”缺乏可信的依据,“三台说”其实是依据“盐泉说”来争状元故里,因此可以存而不论。

苏易简中状元以后回了一次家乡。他到达梓州涪江边时天已黑,对面的梓州城笼罩在夜色之中,但岸边有隐隐的渔火,亲人、故友在潼川渡口兴奋地等待着他。在过江的船上,他看着满天繁星难以自抑,吟出了一首《潼川夜渡》:“清流深夜渡,候吏戴星迎。不见荒城色,唯闻孤棹声。两行蜡炬静,一叶彩舟轻。何处渔家火,遥遥隔岸明。”如果家乡在盐泉,那么苏易简应当走金牛道回绵州,用不着走东川道绕行梓州。当他从梓州到达铜山时,父老相迎,小城沸腾,于是留下了流传至今的苏状元打马还乡图,他走过的桥从此被称为状元桥。

苏易简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但铜山的父老仍然记得他,怀念他,为他在家乡树起了如椽的大笔——苏公笔。

这一走,乡关迢迢,魂归何处?《大清一统志》《四川通志》等记载苏易简葬在三台县西南八十里靠近铜山废县的地方,就是今天离中江广福镇不远的三台景福镇。清《江南通志》又记载苏易简墓在安徽休宁的溪口渔梁。其实,苏易简是葬在开封的。中江广福、三台景福、柳池、绵阳盐泉,更北的江油乃至外省所谓的苏易简墓只是表达了百姓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从这些地方都有苏氏遗迹这个事实可以看出,苏氏家族在早期实际上有一个从中江开枝散叶、逐步北迁的发展历程。

图文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